

21.02

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第 十 二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八一年九月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 十 二 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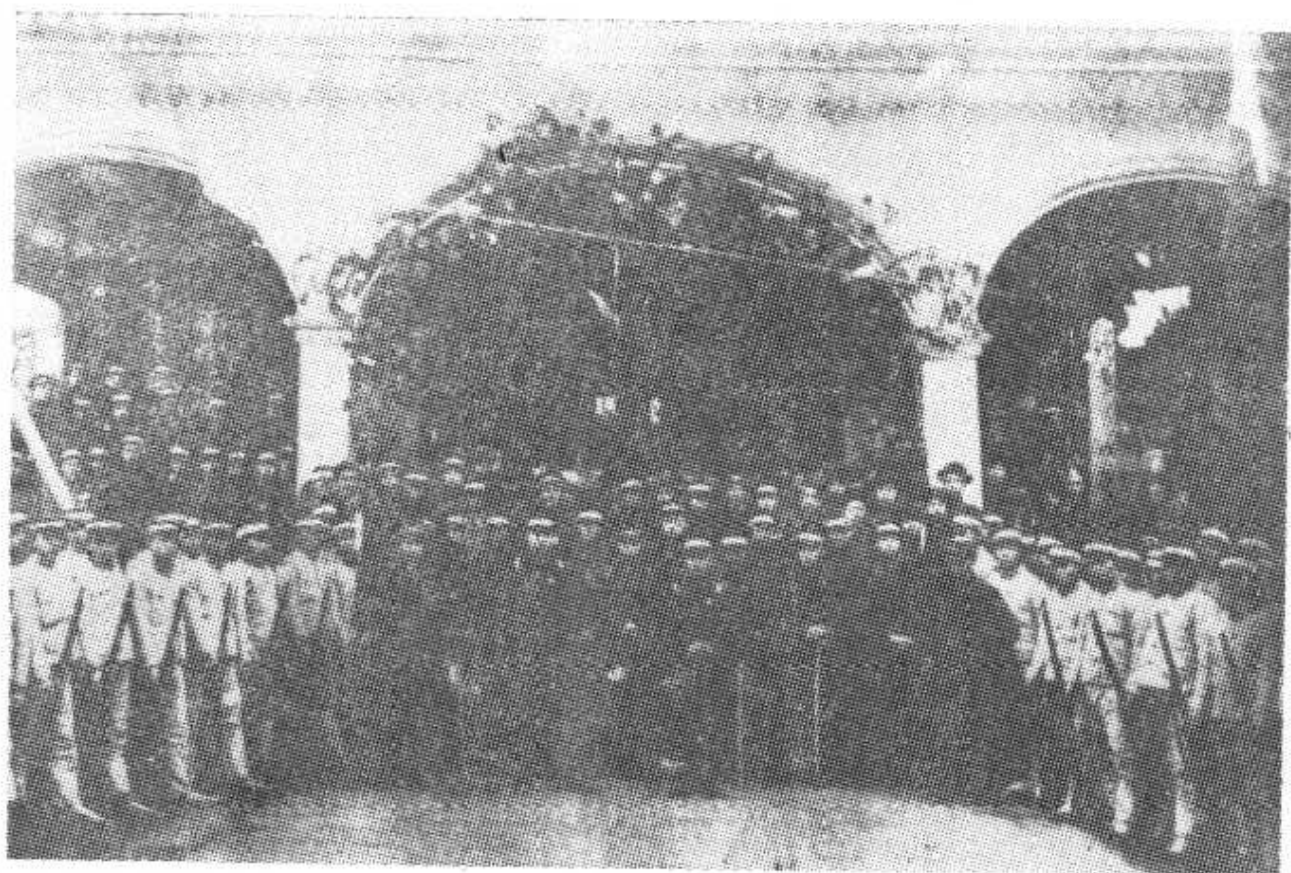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198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内 部 发 行

定价：0.78 元



重庆蜀军政府成员合影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



章太炎先生（二排右起第三人）与
邹容烈士在渝亲属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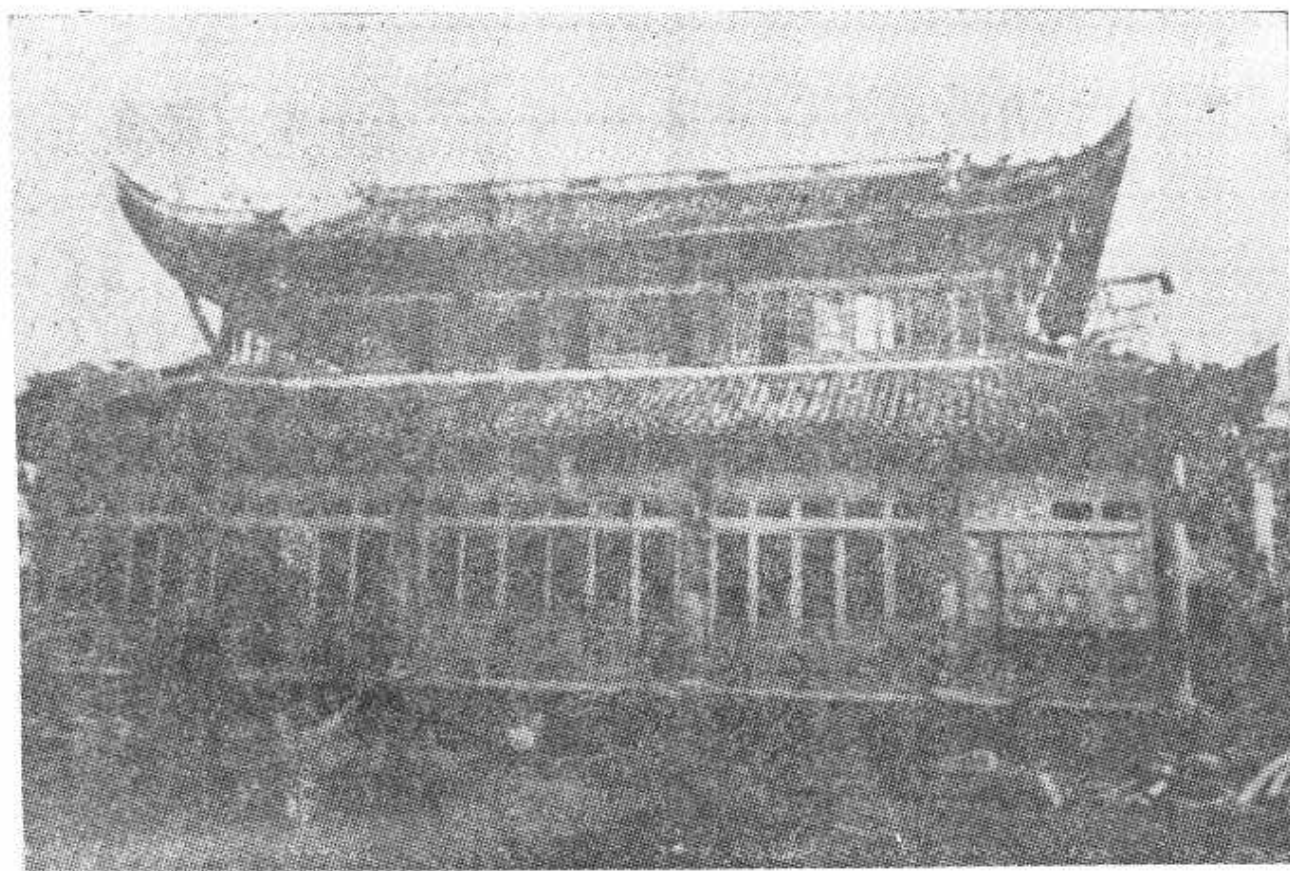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重庆辛亥起义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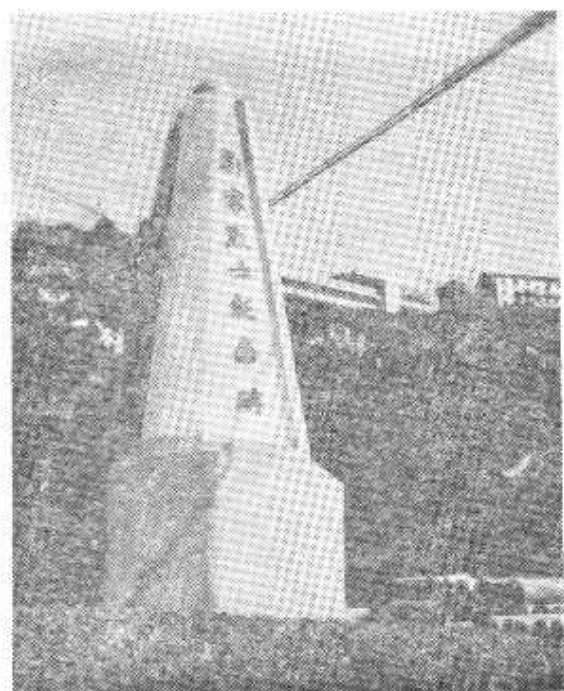


重庆辛亥革命先烈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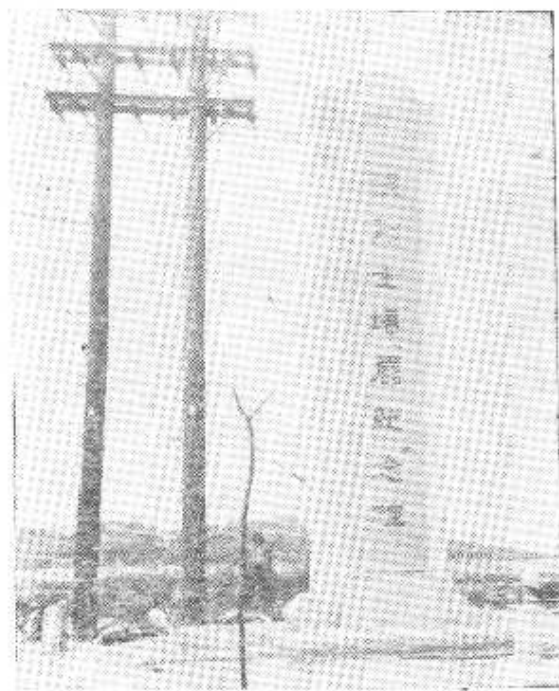




重庆杨沧白先生纪念堂



重庆邹容烈士纪念碑



重庆张培爵烈士纪念碑

目 录

四川辛亥革命见闻	萧华清遗作(1)
重庆辛亥革命扎忆	向思立(35)
蜀军政府史略.....	涂鸣皋(55)
张澜在辛亥革命前后	刘雅清(73)
邹容的家庭及其思想	邹传德 邹传参(86)
邹容和《革命军》	隗瀛涛 蒋晓丽(100)
卞小吾遇难纪实.....	卞稚珊(112)
杨沧白生平	马宣伟(120)
杨沧白事迹补遗.....	何 铮(136)
张列五轶事	张泽孚(147)
周培善从政琐记.....	石体元遗作(152)
重庆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碑	
和杨沧白纪念堂建造简记	唐乃康 张裕纲(165)
重庆辛亥革命大事纪要(初稿)	董章舟(168)

四川辛亥革命见闻

萧 华 清 遗 作

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时，我才十七岁，还没有资格参加革命。一场伟大的革命爆发之前，作为序幕的种种事件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陆续出现，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有识之士早已看出清王朝之摇摇欲坠，灭亡不远了。我那时虽然早在私塾里已读完《书经》和《易经》，但在转入新创设的公立小学里，还在读高小班，我和许多同学都是大的“小学生”。当然，我那时还没有观察时局的能力，但我现在把从儿时和童年记忆所及，以及后来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一幕一幕地反映出来，也许不是全无意义的。我是从我的故乡彭县来看辛亥革命，“以管窥豹，只见一斑”，但集合许多斑也可以逗成一个全豹，我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写下去吧。

一、从不太平的年头儿说起

我的故乡彭县，是川西的一个大县，距成都九十华里；北面从关口起直抵什邡和绵竹都是山地，有以产牡丹著名的丹景山，有“玉垒浮云变古今”的玉垒山，有山顶终年积雪的九峰山和荣华山；关口以南，尽是平原，但旱地多于水田，所以有“干彭县”之称。县城相当大，比邻近的新繁和崇甯就大得多了。城内除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外，也有一些幽静的小巷，这些小巷并不是“陋巷”，而是地主们喜爱居住的幽静地方；小南街就是一条南北向的小巷，巷内没有一间商店或一般住户，尽是一个地主府接

连一个地主府，所以老百姓称小南街叫作“肥猪巷”；其他小巷中也有地主公馆，但它是稀疏地夹杂在一般住户之间。四条大街上，除住户与地主公馆外，所有的商店，一如其他县城一样，应有尽有；但北街上特别多的是绸缎铺，南街上卖黄糖和挂面的特别多，东街上一连几家坛罐铺挤在一块儿，而西街上，靠衙门口附近，又是一连几家卖红豆稀饭的，专供穷人和乞丐吃。有的把四条大街的特点归纳起来，这样地来描绘这个县城：“北街头绸绸缎缎，南街头黄糖挂面，东街头坛坛罐罐，西街头红豆稀饭。”其实这还不够，因为他们忘了“肥猪巷”和南街头的“恶狗村”。南街上有一家茶馆叫做“桂香阁”，每天总有一些地主少爷们在那儿喝茶闲玩；如有女人经过那儿，这批恶少总是要评头论足一番；他们总是嫌穷人穿着不好，但如一个穷人偶然穿一件新衣经过那儿，他们又说：“这家伙今天装舅子吧！”总之，他们对经过那儿的人都要妄加批评，也就是彭县人说的要“称洋称”；大家都憎恨这批恶少，因此把“桂香阁”叫做“恶狗村”。如果说这个县城那时的特点，还要加上两句：“小南街肥猪满圈，恶狗村狂吠乱讹。”这才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地主势力占主要优势的城市。县中很少有绅士不是地主的，也很少有庙会的首事不是地主的。县中有一支歌谣：“文拜相，武封侯，粮户（地主）当了首事尽了头”粮户当然不只能当首事，但首事多半是粮户，这是确实的。

在清朝末尾二、三十年间，彭县一如其他内地的县城一样，仍是一个闭塞的、封建气氛十分浓厚的地方。那时还没有报纸，没有邮政和电报。假如有人因有要事要写一封信给住在成都的亲友，只有委托由县城到成都去的鸡贩子或猪贩子，顺便带去，信上还要批明收信人“交来人酒资壹百文”；那时街道上还没有门牌号数，信面上只好批明成都某某街，某个庙宇或某家商店附近问交；这样地费劲才能够带到一封信。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中国

战败，割去了台湾，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当时县中人多不知道，据说两年多后，中日战争和割台湾的事情才传到彭县，一时茶房酒肆当作一件新闻，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有一个读书人曾为中国战败和割去台湾在家里痛哭一场，而一般人一致地认为从此年头儿不太平了。我就在一八九四年出生于彭县，长到六、七岁时，听过打金钱板的人唱“鲍超打台湾”。鲍超不曾打过台湾，想来一般人都想收复台湾，金钱板的唱词当是那时一般人迫切的愿望啊。

二、洋人、洋货、洋教和洋烟

从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更肆无忌惮地侵入了中国的各个方面，一直深入到穷乡僻巷；洋人所不能到之处，而洋货却如洪水般泛滥，冲击着中国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杂货店的招牌上写的是“洋广杂货”，但实际上是洋货多于广货。洋布、洋缎、洋伞、洋灯、洋蜡、洋油……而洋烟流毒特大。县里的人都把鸦片叫做洋烟，当时在县城外就种有樱粟花，红红绿绿，各种颜色交杂地在田地里开放。至于洋烟馆，几乎每条街上都有，比茶馆还多。烟馆门口挂着一个红灯，上书“烟馆一道”，或“隐君子处”，或“烟霞深处”等等字样。清末吸鸦片的人越来越多，总的趋势是：强者变弱，弱了早死；富者变贫，贫者愈贫。林则徐论鸦片之害说“百年后不特无可可用之兵，且无可可用之民！”县里一般人都说“洋烟是洋人弄来害中国人的！”这都是血和泪的总结语啊。

在彭县，洋货先来，洋人后来；鸦片先来，精神上的鸦片，宗教后来；天主教先来，基督教后来。天主教的传教士是些法国神父，他们头戴瓜皮帽，长袍马褂，有的手中还拿一根长长的菸烟杆，俨然像一个中国人一样。基督教的传教士是个加拿大人，穿的是西服，一般人叫他何牧师。当时有些人把“洋”字误作“羊”字，说洋人有尾巴。何牧师初到县里，住在我家隔壁的静

原店内，许多小孩围着他要摸他的尾巴；他把屁股紧贴着墙壁，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没有……尾巴！”但孩子们还是围着他不走。有一天他从外面走回栈房时，又被孩子们围着了，他便从腰包里取出预先买好的锅魁向孩子们撒去，这样，他就得着了解围。据说哥伦布初次踏上美洲大陆的土地时，红印地安人把哥伦布和他的随从们围着了；哥伦布使用面包向红印地安人撒去，这样就初步收买了红印地安人的心。原来何牧师撒锅魁是有根据的。帝国主义者来到中国，不是把中国人当作非洲人或红印地安人看待吗？真的他们把中国人当作非洲人或红印地安人看待。五口通商以后，沿海大商埠地方常常有人失踪，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者在勾通汉奸，把人绑架当作猪仔卖到美国、欧洲或澳洲去了，如同他们在非洲干过多年的贩卖黑奴的勾当一样。这种情形辗转传到内地，就成为洋人吃娃娃的传说了。一时许多小孩的背上都出现了红十字。我的母亲也用红布做了一个红十字缝在我的衣服背上，说红十字是洋人的上帝，他们不敢抱走背有红十字的娃娃。

有了洋教，也就有了吃洋教的人。这些人有的是由于无知，有的是地痞流氓，借洋人势力为非作歹。我就听说过河坝场的天主堂匿藏土匪，县官派人前去逮捕，神父因土匪系教民，拒绝交出。县官没法，只好把这类案件呈报上司，作为外交案件了事。听说别处有人打教堂，但县里还没有闹到打教堂的事。一般人只不喜欢洋教，特别是一般的读书人。据我母亲告诉我，父亲和他的同窗们都反对洋教，认为它是邪教，也就是他们说的“异端”。母亲也告诉过我朱秀才反教的事情。朱秀才是河坝场的读书人中的一个天主教徒。他家父母都是教徒，他是从小就受了洗礼的。他考取了秀才之后，和县里的许多读书人有了更多的接触，思想上起了变化，后来他毅然宣布脱离天主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都不供奉家神，这是当时一般人最反对的。朱秀才反教之

后，县里许多读书人用红纸写上“天地君亲师”，叫人抬起和吹鼓手一道送去祝贺他。

三、县官与盗贼

清朝的政治是一团糟，这自有正史说明。仅就我童年所看到一个县官的贪污、专横及其暴虐，也就可见一斑了。一个县官是一个七品官，彭县县官叫做“知彭县事”，出布告称“彭县正堂”，自称“本县”。不管他怎样贪污、专横及其暴虐，但他仍是所谓的“民之父母”，绅士们称他“父台”，而一般老百姓只准叫他“大老爷”。人们说官吏贪污是秘密的勾当，这并不完全真实。有一次，一个新的县官来了，一时新旧移交尚未完全办妥，新官便暂把西街我家隔壁的静原店作为行台，接篆视事。县中绅士们前前后后前往贺喜。每个人后面都有跟随的人端着礼物随同前去，在这中间，北街金盛号的老陕送去的礼物特别引人注目，老陕的跟随人是端着捧盒，内盛红纸封的大元宝，堆的高高的。我听着旁观的人说的这叫作“进财”。老陕开的是票号兼放高利贷，一年到头都在和债务人打官司，所以老陕“进财”要特别多些。听说有一些官员从省外派来四川候缺，一候一二十年渺无音信，弄得在街头作算命先生，自己的妻子为人洗衣。忽然一个亲故作了大官，来到成都，把他访到了，立即设法由藩司挂牌，派往一个县里去作县官。一个官员穷得来作算命先生，“太太”在为人洗衣，这上任的一切开支从哪里来呢？老陕的消息最灵通，这时老陕抱着银子送上门来了。于是，不只老爷有了崭新的袍褂翎领，太太、少爷和小姐都穿上了新的上好衣服。至于青纱大轿及一切旗伞道锣等等都不愁没钱备办，当然跟班和轿伕是应有尽有了。老陕借出的这一笔账不只是高利贷而且是短期的。照例老陕要随新官一道去，充任收发，直到收回欠债为止。县官也有恃无恐，据说上任之初，就是单凭“进财”这一项收入就可以完全偿

清他做官的“开办费”了。老百姓们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做清官都有这多的银子，做贪官就用不着说了。川剧丑角演贪官出场时唱道：“为官不要钱，枉自读圣贤！”可算一语道破。

就是这个县官还在静原店住着的时候，便显出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威风。他着人把衙门内的各种刑具——夹棍、板子、木笼、木枷，都摆在大厅上，每天午后他就在大厅上审问案件，而案件又多半是盗案，所以一再用刑，弄得呼天喊地，叫苦叫冤之声充满了整个栈房。

这栈房的老板原是一个老典，姓沈，他因年老辞去公务，把开设栈房作为家庭收入的一项补助；又因他在衙门里干过事，把新官上任的这一套也看得多，所以满不在意。

“沈师爷，你栈房里这几天好热闹呀！”这是一个邻居的人对着他说的。“热闹！简直是闹丧一样！”沈师爷不满意地这样回答。沈师爷当过老典，年近七十，是县中的一个绅士，邻居的人认为他发这一点牢骚也是很平常的。

新官有时夜间审案，打板子声和叫苦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也感觉这个新官太讨厌了。好在不久旧官交卸完毕走了，新官立即迁进县衙，静原店也就恢复了平时的宁静。

一个早晨，我家对面桓侯庙的茶铺内喝早茶的人纷纷在谈论沈老典昨夜被县衙门派人抓去了的事。大家都觉得这是晴空霹雳，都在询问究竟为了什么事。沈老典的老婆哭哭啼啼也来到茶铺，邀请本街的保正和乡约，进衙门去探问一下究竟他家老典犯了什么事情。沈老婆子一再地说：“昨夜三更的时候，几个差人来打门，进了我家，横不讲理地便把他从被窝里拉起来，反捆着手拉到衙门里去了！天呀，他这大的年纪呀！”

本街的保正和乡约立即一同进了衙门，他们刚走到二门，便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个木笼，笼内站着的便是沈老典。他感觉得十

分羞愧，把脸拿来朝着墙壁，不面向众人。保正和乡约向沈老典问询之后，才知道昨夜县官审讯盗案，一个强盗把沈老典咬了一口，所以他立即被抓进衙门对讯。仅管他力说与这个强盗无关，但他还须关在站笼内再候讯问。保正和乡约以他年老为词，立具保约，恳请县官开恩，准他回家候讯。这样沈老典站了一天站笼，下午才准保在家候讯。但他一回家后便卧床不起，不几天就死去了。谁也知道沈老典是个好人，但他怎么会被牵涉到盗案呢？这个问题就成为桓侯庙喝茶的人的谈话资料了。本街的乡约说：“灭门的知县！谁叫他爱发牢骚啊！”他的这句话却道出了沈老典被牵涉到盗案之谜，于是大家只好面面相觑地慨叹一声“啊”！

县官审讯的案件除闹家产和债账纠纷而外，盗案特别多。审讯通常在二堂内进行，有时在大堂上，特别是用大刑的时候，这时老百姓都可以在前面围着观看，我有时也挤在人丛中观看。大家倒不是要听听案情的是非，而是要看看如何用刑，想来县官在大堂上当众用刑是有“以儆效尤”之意，但盗案仍是愈来愈多。绑架有钱人，在彭县叫作“拉肥猪”。如被拉的是娃娃，这就叫作“抱童子”，被拉的是女人，这就叫作“接观音”，至于明火抢劫和偷盗耕牛更是常事。我看见县官用过的各种刑罚：从打板子，上夹棍，烧背心，装吊笼，杀头，绞毙直到钉活门神（钉十字）与倒挂金钩。桓侯庙杂铺里经常喝茶的老年人慨叹道，“从前，一连发生三起盗案，县官就要被撤职，现在，这年头儿，唉，唉！”这些盗案中究竟有没有冤枉无辜的人呢？我听着老百姓说：“衙门八字向南开，有理无钱休进来！”他们对衙门的评价既然是这样的了，谁敢去向衙门问一个是与非、曲与直呢？

四、从监生的肚皮说起

许多人抽水烟或旱烟，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在我的童

年，我看见一个人抽烟，迂着他的烟管不通顺的时候，总是这样说，“这烟管简直是监生的肚皮！”我不懂他的烟管怎么与监生的肚皮有关？年龄渐渐大了，我才知道他说的是歇后语，下面还留有“不通”二字。肚皮不通即指文字不通。十个监生就有九个的肚皮是不通的；既然肚皮不通，又怎么能当得上监生呢？这中间有一个捐钱买功名的问题。大地主或大商人有的是钱，就差一个功名。在清朝，官吏的制服是戴翎顶，穿袍褂，而顶子是有颜色的。从秀才到状元，尚未实授官职的时候，红缨帽上只戴有一个铜顶，美其名曰“金顶”。在迁祭神或庆吊事项，有功名的人多戴上金顶的红缨帽，穿袍着靴；大地主或大商人也穿袍着靴，戴红帽，但帽顶上只露出细细的，光秃秃的一根铜尖，而一个穷秀才，尽管他的靴破了，袍旧了，但红缨帽上突出地露出一个金顶，这时地主或商人看见那个顶子是十分眼红的。有什么办法弥补他们的缺点呢？有，那就是皇帝在做无本经商的生意——卖官鬻爵。皇帝不会公开说他在卖官，而是在军需浩大，或荒年需要大量赈款的时候，要他的臣民“体念时艰，踊跃输将”，他也就对响应捐输的人奖给一定的功名，所给功名的大小，要看捐钱的多少来决定。起码是从监生捐起。监生又分“土监”或“京监”，据说“土监”大的只花一百多两银子，“京监”当然又要多一些了。不管“土监”也好，“京监”也好，红缨帽上安了一个顶子，杂在真有功名的人士中间，秀才举人和监生都是一样地穿着了，这才真真叫“鱼目混珠”。一家人中，只要一个人有了一点功名，好象兄兄弟弟都有功名了，譬如对一个监生家里的兄或弟，人家也把他当做是个监生，称作“大监生”、“二监生”或“么监生”，真是“可怜光彩生门户”了。

有些地主的大门上悬着一道黑漆的匾，上书“大夫第”三个大大的金字，从这一道匾看去，人们就可以知道这家地主是捐过了一个什么“奉政大夫”之类的官衔的。有的只捐一个知县官衔

也就心满意足了。有的索性再多花一点钱，派到外省候补，实授知县的。我家斜对门文家“大夫弟”内的文老六就是派到甘肃实授了一个县官的。他家门上悬着两个大滚子纱灯，白底红字，大书甘肃什么县正堂的字样。在清朝，不只监生可捐，县官可捐，就是三品官的道台也可以捐得到的。东街上的张道台本来是一个一窍不通的大地主，他就是一步登天，捐了个道台。他家门上悬挂的两个大滚子纱灯，也是白底红字，大书“江苏候补道”几字。张道台从来没有到过省外，也就没有实授过道台，但他的顶子是粉红色的，一般的人称他“张大人”，也就比县中许多功名中之人只被称作“老爷”阔气多了。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庚子之变”震动了全国，人们纷纷地在谈论着八国洋人闹北京和光绪皇帝奔长安的事情。我家邻居徐大爷的儿子在外面“跑粮子”，据说是在巡防粮子内当兵。他突然从成都回家，向他的父母说他们的粮子不久要开到长安去“保驾”，他是特别请假回来告别家人的。恒侯庙茶铺内喝茶的人也就把“保驾”的事情议论开了。有一些读书人说，这是“五胡乱华”的重演，表示非常愤慨。而另一些绅士却说“这倒是捐官的好机会啊！”果然，县中不久又出了一个比张道台更阔气的贺道台！

贺道台的父亲是县中的一个大地主，住在北乡，有良田一万多亩，他的儿子是有名的“开方秀才”。他的儿子之能够取为秀才，并不是因为他精通算术上的开平方和开立方，而是因为他的秀才是上上下下花了一万两银子搞出来的。清朝的商人早已把“萬”字简写成和“方”字类似的“万”字，“开方秀才”含有花了一万两银子当秀才的讽刺意味。贺道台的父亲认为只有钱而没有名是很不适合的，所以在所不惜地花一万两银子搞个秀才，这才勉强算得个有钱有势。这时，贺老头子也看准了“庚子之变”是捐官的大好时机，不可错过。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给他儿子